



译林出版社

〔英国〕阿兰·西利托 著 孙法理 译

周六晚与周日晨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周六晚与周日晨

[英国]阿兰·西利托 著 孙法理 译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六晚与周日晨 / (美) 西利托 (Sillitoe, A.) 著; 孙法理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5
(译林现代经典)
书名原文: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ISBN 7-80657-642-8

I. 周... II. ①西... ②孙...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9046 号

Copyright ©1958 by Alan Sillito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0-041号

书 名 周六晚与周日晨
作 者 [美国]阿兰·西利托
译 者 孙法理
责任编辑 袁楠
原文出版 Flamingo, 199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淮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68 千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42-8/I·482
定 价 (精装本)14.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孙法理

1

1945年二战结束,在战后的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带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家流派。英国的叫做“愤怒的青年”,美国的叫做“垮掉的一代”。前者的代表人物有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凯丝·沃特豪斯(Keth Waterhouse)、柯林·威尔森(Collin Wilson)等,后者的代表人物有阿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格利高里·科尔索(Gregory Corso)、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等。本书作者阿兰·西利托(Alan Sillitoe)是英国“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人物之一。

“愤怒的青年”一名是1956年开始流行的,但在那以前就已在酝酿中。先是莱斯里·阿兰·保罗(Leslie Allan Paul)在1951年出版了一本自传,书名就叫《愤怒的青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54年金斯利·艾米斯出版了《幸运的吉姆》(Lucky Jim),描绘的也是对现实不满的青年。1956年约翰·奥斯本的剧本《愤怒回顾》(Looking Back in Anger)在剧院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剧本抒发了代青年内心的幻灭与愤懑,出版界借用了上述书名“愤怒的青年”来称呼剧里的主角吉米·波尔特。以后“愤怒的青年”便变成了一批作家的名字,形成了一个流派。1957年,著名演员劳伦斯·奥利佛爵士(他主演的电影——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国观众

是很熟悉的)又在约翰·奥斯本的第二个剧本《娱乐者》(The Entertainer)里饰演了主角,使“愤怒的青年”更加名噪一时,成了当时英国文坛的主流力量。

“愤怒的青年”派作家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毕业于普通大学而不是牛津、剑桥之类的名校。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直言不讳地抨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阶级偏见,蔑视英国的现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伪善与平庸。他们有的还以自己的下层阶级生活方式为荣,向中产阶级的妄自尊大与装腔作势提出挑战。

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同样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扞伐,只是加上了一些嬉皮士的词语和禅宗的神秘内容。

这两个流派的兴起是和当时的世界形势直接关联的。二战后世界形势大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统一的世界一分为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大批新兴力量国家,跟旧有的欧美集团对立,以其正义性的英勇斗争刺激着英美青年,使他们从内部杀将出来。“愤怒的青年”和“垮掉的一代”就是这种心态在文学上的反映。但遗憾的是,随之而来却是斯大林神话的破产、中苏交恶、赫鲁晓夫垮台,青年们再次陷入迷惘,这两个流派在六十年代后期便衰败下来。

但是,这两个流派却给世界文学留下了一批值得注意的作家和作品。在美国有诗人阿伦·金斯伯格和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等,在英国则有戏剧家约翰·奥斯本、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和本书作者阿兰·西利托等。

2

阿兰·西利托(1928—)是“愤怒的青年”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以其沉重、粗犷、愤怒的现实主义风格独树一帜,把新的活力注入

了二战后的英国小说。

他 1928 年 4 月生于英国诺丁安郡的诺丁安城。父亲是个硝皮匠。第二次世界大战白热化时的 1942 年,他才十四岁便辍学进了工厂做工,直到战争结束,十八岁时他进了英国皇家空军系统,在马来亚做过两年无线电报务工作。回英国后因患结核病住院数月,然后回到家乡诺丁安和肯特居住。再以后的六年里他迁居法国和西班牙。经过诗人和诗评家罗伯特·格莱夫斯启发,他开始以故乡诺丁安市的生活为素材进行写作。

本书《周六晚与周日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是他的处女作。这本小说在被四家出版社拒绝后于 1958 年出版,立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59 年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长跑运动员的寂寞》(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获得了霍索恩顿文学奖。1960 年《周六晚与周日晨》由他自己改编为电影上映,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后来他又参加了自己的短篇小说《长跑运动员的寂寞》的改编,1962 年小说被拍成电影上映。他的《收破烂者的女儿》(The Ragman's Daughter, 1963)和《将军》(The General)也都曾被改编为电影上映。

他的小说还有《威廉·波特之死》(The Death of William Porter)、《鳏夫的儿子》(The Widower's Son)、《讲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门钥匙》(Key to the Door)、《生活的一次启动》(A Start in Life)、《原料》(Raw Material)、《出自旋风》(Out of the Whirlwind)、《她的胜利》(Her Victory)、《失落的飞艇》(The Lost Flying Boat)、《下山》(Down From the Hill)、《生命继续》(Life Goes On)、《开着的门》(The Open Door)、《最后的情人》(Last Loves)、《列昂纳德的战争》(Leonard's War)、《雪站》(Snow-stop)、《破马车》(The Broken Chariot)等。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小说集》(Collected Stories)和《鳄鱼嬉戏场》(Alligator Playground)。阿兰·西利托还出版了八部诗集、一些儿童读物和一本回忆录《没有风流韵事

的生活》(Life Without Amour)。

3

乍读本书的人会觉得它是个浅薄浮躁的青年的生活记录。

青年工人亚瑟·西顿一出场就酒气熏天。他跟人赌喝酒,醉得昏天黑地,从楼梯顶一骨碌摔下了楼梯底。起来后他又两次呕吐,呕脏了一对夫妇的两身衣服,眼看处境狼狈,便逃之夭夭,到了情妇布伦妲家过夜,第二天中午又在她的丈夫从后门回家时从前门逃走。

然后便是种种劣迹。在酒吧因为琐碎小事跟人斗殴,大打出手;酒后叫汽车刮了一下,便跟他哥哥佛莱德把那汽车掀得侧立起来(车主已醉得不省人事);参加鹅市节狂欢,在“恐怖列车”里扯掉“骷髅架子”,引起众怒;跟三个女人同时恋爱,布伦妲跟他有了孩子只好用热酒浴打掉;他刚离开布伦妲却又上了她妹妹温妮的床;以后挨了温妮的丈夫一顿痛打,躺了半个月,无可奈何才决定跟第三个女人结婚……而这样的人偏偏激烈得要命。他梦想着有一天造出炸药,把工厂和议会大厦炸个满天飞。

他身边的人也大体如此。一战时父亲和舅舅用种种办法逃避兵役,二战时几个表哥从部队逃出,受到追捕,没有口粮也没有钱,以盗窃度日;姨父在一战后从法国带回家两个画框,是抢掠来的“战利品”,原来英国士兵在法国干过匪徒一样的事。

这本书描写的仿佛就是这样的人,九分闹剧,一分正剧。但是,读完之后,掩卷细思,印象却翻了过来,这是百分之百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亚瑟和女人来往考虑的不是爱情,而是性欲。那是许多工资奴隶的生活方式。他是个车工,早上按时打卡上班,整天站在机器前劳动,用他的话说是“累得翻肠倒肚”,尽管也能设法找出闲暇开玩笑。六天活累完,到了周末,只想两件事:喝酒、找女人。酒让他麻醉,女人让他发泄。然后随着“黑色星期一”的到来,他又去服他所说的“终生苦役”,守着机床反复做那几个机械的动作。眼睛望着机器,双手不离机器,满耳机器声、皮带声,满鼻子油污味、肥皂水味、钢屑味,“累得贼死”。熬到星期六晚,又匆匆去喝酒、找女人。如此循环,无穷重复,过的是十足的工资奴隶的生活。关在厂里的六天是看不见天日、看不见大自然的,星期日到河边走走,看看风景是他另一种享受。

他是无可奈何才结婚的。他找女人原有他的如意算盘。只找结过婚的,两相情愿,互相满足,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必结婚生孩子、背家庭包袱。但是,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布伦妲怀孕了,孩子是他的。烦恼逼人而来。他只好去求助于阿达姨妈,用热酒浴加醉酒把孩子打掉。他眼见布伦妲热酒浴时的惨痛,不禁深深懊悔,一再喃喃地说:再也不干了,再也不干了。

可他却马上找上了布伦妲的妹妹温妮,秘密随即泄露,他被温妮的丈夫约了同事追踪了许久,结果挨了一顿痛打,很久起不了床。

浑小子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却又离不开女人,终于下定决心跟陶丽安结婚了。看来结婚是最佳选择,不必眼见堕胎的苦难;不必随时提防挨打;还可以搂着女人放心睡觉,不必半夜逃走。不过,亚瑟对结婚有自己的规矩。表姐伽茵因为口角打得丈夫头破血流的事给了他教训,他决定:结婚以后要是老婆敢打他,他是要

还手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亚瑟的尴尬婚姻。从不想结婚到终于结婚，随后的日子是可想而知的：生孩子，少则像他爸爸家四五个，多则像他姨妈阿达家十四个，只有星期天全打发出去看电影时家里才能安静一会儿，否则就永远人声鼎沸、天翻地覆。妻子只好回家做专职主妇，把挣钱的任务全转到丈夫身上。而且，如果妻子打了他，他是要还手的。那就意味着更加沸反盈天的生活。我们这位活蹦乱跳、好勇斗狠、聪明狡猾、耽于幻想的亚瑟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命运。

对于这一前景亚瑟并非没有看见，他当初决定只找已婚妇女时便已预见到了。因此，在他终于决定结婚之后，似乎堕入了“哲学思维”。他在河淀柳阴里钓鱼时说“钓到了鱼也就是被鱼钓到了”。此话貌似玩弄概念，出于他之口却耐人寻味。鱼当然不可能钓到人，但是陶丽安这条鱼却真真实实钓到了亚瑟这个人。而且，与此同时，他俩都被社会钓到了，从此失去了自由。可是，分明知道那是鱼饵却偏要去吞，这又是为什么？亚瑟问自己：我是不是醉了？回答是：“我没有醉，我清醒得像冰凉的石头。”结论是他认命了，在这场“古老的战争的最后一战”里他做出了抉择，那就是“跟陶丽安一起往世界绽开的裂缝里陷进去”。

用亚瑟自己的话说，今后的日子就是，“跟妈妈和老婆斗，跟房东和领班斗，跟铜扣子、军队和政府斗。除了干非干不可的活儿和想法花掉工资，不是这样斗就是那样斗。我生命的每一天都必然有麻烦等着我，因为麻烦一向就有，以后也会有。生下来就醉了，结婚又盲目，错误投生到了一个疯狂离奇的世界……每个星期一早晨把你拽回工厂去的只能是钱。”

这就是等着他的生活，他是“明知故犯”。何况还有战争！

战争不是恫吓，不是空话，而是冷冰冰的现实。他们的父辈已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自己又已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

大战之间他们对政客们反复无常的宣言已经听腻了。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的绥靖政策纵容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势力。1938年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同年希特勒就兼并了捷、奥的苏台德地区，1939年占领了捷克、但泽自由市和波兰，1940年又突然袭击和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英国终于卷入了战争。政客们的翻云覆雨把全国的青壮年送上了前线。亚瑟进了部队，经受了煎熬。他的表兄弟们从部队逃出，从此遭到“红帽子”追捕，四处逃亡。因为没有配给证又没有钱，只好靠偷盗为生，跟妓女生活。随后，他们又被抓住，再次被送上前线。后方的人也忍受着战争的折磨。物价飞涨、供应奇缺、食物配给、生活艰辛，只好在贮煤间养鸡，开辟了院子里的地面种菜。他们还随时遭到德国飞机的轰炸扫射。亚瑟的爸爸就几乎因此死去。蹲防空洞蹲得一家人满身疥疮，耳朵里随时听着警报和轰炸的声音。这就是战争，他们亲身经历的好容易熬过来的战争。

战争结束了，九死一生活下来了，生活也改善多了，甚至可以分期付款买电视，连“电影院”也搬回家了。还可以存钱买摩托车，而有的人，比如领班罗波，甚至买了辆二手的莫里斯汽车。可是冷战开始了，说什么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这回口气很大，据说强光一闪就可以得胜还朝。但是，政客们的话可信吗？斯大林不是说过炸弹可以用炸弹回敬吗？英格兰会不会变成广岛长崎？何况敌人已经不是德国佬，而是老朋友苏联，德国佬忽然变成了朋友。这不是在拿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苦难瞎折腾吗？

难怪人心惶惶，有了钱就赶紧花，因为“一年一年地存钱是没有意义的，是傻瓜才玩的游戏”。大家都“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想“狂欢十天，把所有积蓄花个精光”，否则一旦战争爆发，岂不落个鸡飞蛋打。

难怪人们要产生激烈的幻想！亚瑟在打靶时老幻想拿上级军官当靶子，而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把工厂、领班和厂里生产的摩托车

炸得满天飞，把议会大厦炸得满天飞，然后坐着飞机到莫斯科或北极坐下来，像马一样哈哈大笑。

他的幻想当然幼稚，但他不能不幼稚。

亚瑟十五岁进厂，他的女友陶丽安十五岁进厂，领班罗波十四岁进厂（本书作者阿兰·西利托也是十四岁进厂）。别的人书里没有交代，但可以肯定也是如此。机修工杰克、头号“人民公敌”定额员、布伦妲、温妮也只能是十四五岁进厂。他们都没有读过几天书，对现实的反映就只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幼稚是必然的。

道德堕落随着幼稚而来。追求酒和性不光是亚瑟和男工们的要求，也是女工们的要求。布伦妲背着丈夫跟亚瑟睡觉，堕胎后还跟他来往，却同时另结新欢（这是温妮对亚瑟默许了的）。温妮的丈夫第二天要回家，她头天晚上还把亚瑟带上床。她的丈夫知道了，追踪亚瑟，要打他，她照样瞅空子跟亚瑟睡觉。陶丽安没有男朋友时惶惶不安，找到了亚瑟便想炫耀，开始时还防备亚瑟动手动脚，以后就索性带他回家，跟他上床了。她的母亲也找了个因语言障碍而难以与之交谈的印度人同居。亚瑟的姨妈因为女儿蓓蒂在俱乐部迷住了一个男人、白花了她许多钱而得意。亚瑟生气时骂她们是“淘金”、是“鸡”也并非没有道理。这就是那时英国工人的现实生活，是很有代表性的生活截面。

作者笔下的人群间显然有一种严重的分裂和对立。同是十四五岁进厂，亚瑟愤世嫉俗、嬉笑怒骂，无政府主义严重；而领班罗波却读夜校、学技术，年长之后做了领班；“人民公敌”定额员和机修工杰克走的大约也是罗波的路。但是他们在工人们面前都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定额员尤其如此，他有个很不雅的绰号“人民公敌”，却见了谁都点头哈腰。这是为什么？我们从砸窗户事件可以大体看出点来由。

那是在第七章。那天晚上亚瑟跟他哥哥佛莱德一连惹了三起祸：在俱乐部跟人打了一架；把一个醉鬼的汽车抬得侧立了起来；

遇见人砸窗户，在旁边煽风点火。

砸窗户事件是这样的：亚瑟和大卫在俱乐部打完架出来，看见一个男人砸破了一家商店的窗户，叫一个穿军装的女人捉住了。从常理看，砸窗户的人显然不对，交给警察也是应该的。但奇怪的是，路过的旁观者却都同情那男人，而看不惯抓他的妇女。原因何在？因为那妇女“站在了秩序和法律一面，大家都对她反感”。他们指责说，“她跟这可怜的家伙说话简直像对垃圾一样”。亚瑟更极端，对那女人说，“把他交给铜扣子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们这种家伙简直不叫人活了。”这话的逻辑很怪，可亚瑟一出口，人群随之起哄，要求放人，并鼓励砸窗户的人逃跑。那人一有逃跑的表现，人群又立即喝彩。你看，公民们普遍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上了。可以套用一句老话说，“凡是政府反对的他们就要拥护，凡是政府拥护的他们就要反对。”这就是这次事件的奇怪逻辑，也是领班、检验员畏首畏尾的原因。

这种逻辑在气枪事件的一个插曲里也可以见到。亚瑟因为布尔太太散布他的谣言，偷偷打了布尔太太一气枪，闹出了轩然大波。两家人站到院子里大吵大闹。看热闹的罗宾太太被那激烈的争吵吓坏了，晕了过去，她的丈夫急忙利用这机会回屋去拿威士忌。这时作者说，“这倒是个好借口，可以使他置身事外，因为他是个让儿子参加童子军，而且投自由派票的人，在街道上团结一致的反政府主义工党里是个叛徒。”从这里我们看见了两个问题：一是站到政府一边的人成了“叛徒”；一是街道上的“反政府主义工党”的“团结一致”。所谓的“反政府主义工党”是俏皮话，指的就是跟亚瑟持相同的反工厂反政府观点的工人，他们势力很大，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凡是不反对政府的人都成了“叛徒”。而在工厂里站到工厂一面的人自然也是叛徒、公敌。亚瑟和佛莱德把一个酗酒睡倒在路的人送回家，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跟警察对立，不让那人被警察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曾指出，亚瑟家跟领班罗波家的对立已经有好几代人的历史。这就是工厂里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天然对立，是无法抹去的阶级敌对。罗波这样的人的畏首畏尾乃是必然的。

这就是阿兰·西利托笔下的英国社会，一个赤裸裸的、没有粉饰的、群情激愤的、跟传统及政府对立的英国下层社会。这本小说没有巧妙的悲欢离合，只有朴素严酷的现实，可正是作者这面对现实的勇气和他笔下的现实打动着读者。我们可以把本书跟存在主义联系起来，说从它看出了“存在就是荒谬”的道理，这很对，但是西利托没有那么“哲学”；我们也可以把本书跟黑色幽默联系起来，说它的幽默叫人沉重，这也很对，但是，西利托没有那么幽默。西利托的准确定位就是“愤怒的青年”。他在为本书 1979 年版所写的序言里是这样说的：

“这本小说刚出版时不少人有一种错误的设想：它是自传性的。事实并不如此，至少就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如此。我写此书时离开工厂已经十年。小说虽然反映了我从小生长于其中的气氛，故事却都是想象的，每个角色都是像做拼图游戏一样拼凑而成，到最后就没有一个角色可以确认。

“我脑子里没有主题，只有写作的欢乐和为写得清楚、真实而流的汗水；我只努力按照我所知道的情况刻画普通人，刻画得让他们能认出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费了很多时间，困难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多。”

可见，这小说尽管不是自传性的，却“反映了我从小生长于其中的气氛”，人物虽是拼凑而成的，却都是按照作者所知道的普通人刻画的，他希望“刻画得让他们能认出自己”。而其结果却是：我们从小说中看出了残酷的现实，而那正是作者“真诚的声音”。

西利托在那序言里还说：“其中几章原写成了短篇小说，有些还寄给了杂志，可是没有被采用。小说里还有一两部分（包括周日

晨在运河边钓鱼时的反思)原来是写成诗的。”

可见小说原包括了些短篇小说和诗。这些部分熔铸到了小说里,当然不再独立,但是,仍然依稀可辨,是可以当做小说或诗读的。例如五彩缤纷的鹅市节场面和阿达姨妈家那喧闹的圣诞节聚会都可以当做民间风俗画来读。而描写运河的几节文字则显然是情景交融的好诗。这些读者都不难感受到,就不用译者饶舌了。

2001年6月28日于西南师大

1979 年版作者序

《周六晚与周日晨》最早发表于 1958 年秋天,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

最为本书的成功感到意外的是我自己,甚至超过了书评家和评论家。此书的最后定稿是 1956 年至 1957 年在玛约佳岛^①完成的。不过书中有好些章节片段是从 1950 年起就开始写的。因此,到打成最后文稿送到伦敦时,已经陆续写了七年。

其中几章原写成了短篇小说,有些还寄给了杂志,可是没有被采用。小说里还有一两部分(包括周日晨在运河边钓鱼时的反思)原来是写成诗的。都不过是些情节,但是用到小说里恰到好处,因为它们或者是跟某个角色——亚瑟·西顿——有关,或者是围绕了一个城市和一个家庭。

这些速写和故事已经遗失,因为那几年我在西班牙做学徒,很穷,东搬西搬,文稿不断增加,笨重得可怕,无法全塞进箱子里去。

四家出版社拒绝过这本小说。我以为它最多可以为我赚到两百镑,曾经打算靠它回玛约佳岛住一年,直到再写一本书出版——希望那本书也可以为我赚来同样的数目,而且打算就像这样过下去,写下去。

这本小说刚出版时,不少人有一种错误的设想:它是自传性的。事实并不如此,至少就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如此。我写这

^① 玛约佳岛:西班牙以东的海岛,在地中海里。

书时离开工厂已经十年。小说虽然反映了我从小生长于其中的气氛,故事却都是想象的,每个角色都是像做拼图游戏一样拼凑而成,到最后就没有一个角色可以确认。我猜想中产阶级景况下的作家写作时也都如此。

我脑子里没有主题,只有写作的欢乐和为写得清楚、真实而流的汗水;只努力按照我所知道的情况刻画普通人,刻画得让他们能认出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费了很多时间,困难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多。

这些我是否做到了,不能由我自己决定。我至今还是个作者,而不是评论家或书评家。我太耽溺于构思自己的小说——跟当年构思这本小说时一样。就其终极意义而言,我甚至当自己作品的读者也还不够格。归根结底,《周六晚与周日晨》,有着它的放肆与局限,它曾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现在仍是如此。可是我觉得自己从这部作品里找到了我真诚的声音,如果说我至今还喜欢它的话,原因就在这里。除此之外,就得由读者决定了。

阿兰·西利托

1979 年

第一部

周六晚